

# 中缅佤人国家意识建构的历史叙事

郭 锐

**内容提要** 本研究以中缅佤人为叙事主体。从近现代历史脉络入手,结合笔者田野调查资料,意在观察中缅边界的佤人社会,上溯200多年间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跌宕,包括:断断续续的中英划界中所谓“中华帝国”的立场曾摇醒了佤人国家意识的朦胧认知;18世纪汉人在佤山的开矿活动又加强了佤人同中国内地的经济往来和与清帝国中央的联系;抵抗英缅政府对阿佤山的渗透过程,反而使得佤人中国认同的觉悟显著提升;在二战中与国民政府军一起浴血奋战反击日军曾一度强化了佤人对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20世纪50年代在中南半岛的国共纷争又使佤人的国家认同一度陷于困惑;60年代中缅划界的尘埃落定似乎促成了中缅两边佤人各自再造国家认同的意识。但事实上,处在复杂历史场域中的佤人始终在国家意识和族群认同的问题上纠结不止,国家意识的建构和族群内部的撕裂并存,这是当下世界范围内多民族国家之间跨境少数民族裔建构国家意识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关键词** 佤人社会 中缅划界 族群认同 国家意识

## 一、基本概念与叙事背景

佤人是一个主要分布在中缅两国边界地区<sup>①</sup>的古老族群,该族群在缅甸称之为拉佤或佤,在中国称之为佤族。各个朝代的中文史籍对该族群有诸多称谓,迄今为止,其族群内部也还存在不同的分支及自称。如“佤”、“巴饶克”、“布饶克”、“阿佤”、“阿卧”、“阿佤莱”、“勒佤”等。<sup>②</sup>同时,因佤族长期与其他族群交错杂居,故各地亦有不同他称。历史上的阿佤山这块区域,在汉文典籍中也曾被表述为“既不属华,亦不属缅”的欧脱之地。<sup>③</sup>因本研究讨论的范围突破了现代国家和行政区划等疆域,仅以自然分布为基准,泛指传统意义上佤人自然分布的主要地理范围,故文中有意识地使用佤人社会这一统称。

“近代”这一概念源于西方,意为介于现代与古代之间的年代。在西方,基本上是以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近代”的开端。在中国,关于“近代”的界定,因历史学者们对于历史事件持有不同观点,解读各有殊异。因此关于近代历史的划分,向来没有统一标准。近年来相对统一的观点认为,时代的划分应以社会性质的改变来确定。照此理解,应视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段时间,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整演变的过程为中国的近代。但本研究因涉及世界近代史,同时又始于中国清王朝的表述,在时间跨度上囊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全过

<sup>①</sup> 这一区域习惯称之为阿佤山,位于从中国延伸进入缅甸境内的怒山山脉南部,面积约为5万平方公里。它在近300年来已经成为佤人族群的世居之地。

<sup>②</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民族研究所编《佤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一),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页。

<sup>③</sup> 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以近代中英边界谈判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程,故采用西方“近代”的划分标准。

以阿佤山为中心来看近代历史:北面的中国,依次历经了满清王朝、国民政府(包括军阀混战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逐渐走向了独立建国的道路;南面的缅甸,先后经历了东吁王朝、雍籍牙王朝、英国殖民统治、日本帝国侵占时期,也由殖民地国家,经过不断抗争走向了独立建国的道路。

19世纪上半叶,缅甸曾经与占领了印度的英国殖民者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兼并战争。结果,英国人获胜占领了整个下缅甸,而且不断寻找机会和借口图谋北进。1885年底,英缅之间第三次开战,缅甸再度战败。至此,缅甸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这段时期,英国人吞并缅甸产生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即是英殖民帝国开始与中华帝国临界。不断扩张与侵略的殖民本性,注定了英国殖民势力觊觎北边的中国成为必然。事实上,此后英国人在中缅之间制造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一系列边界纠纷,佤人族群的社会变迁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进入现代历史阶段,佤人社会又经历了两次前所未有的震荡与嬗变:一是新中国的建立及其在佤人社会实施的制度化建设;二是缅北佤邦的诞生及其20多年佤人社会政权化的经营实践。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和社会背景之下,世代生存于阿佤山的佤人族群尽管始终远离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治中心,视野长期囿于村寨与部落的疆域,政治概念也不曾越过土司、部落与村寨中头人和长者的边界,但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得该族群无可选择地被历史卷入英、中、缅三国关于诸如领土与国家疆界划分、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当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纠结之中;也因此开启了佤人社会寻求认同意识、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等这类本源性的认知动机,从而使佤人的传统生活契入现代社会的大潮之中,深刻地影响到该族群后续发展的历史轨迹。

## 二、国家意识的构建过程

如何理解佤人对国家意识的建构过程,依笔者观之,在时间上,可分为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分别加以考察;在方法上,可沿两条路径入手:一是通过贯穿近现代涉及佤人社会的几个大的历史事件来展示,二是检视近现代史上英、中、缅三国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及其划定的过程。循此路径做历时性的梳理,即可展现佤人国家意识建构过程的大致轮廓。

摊开近代历史,涉及佤人社会的重大事件包括茂隆银矿的开采、班洪抗英事件、阿佤山区的抗日斗争、国共内战的尾声等历史事实,以下按顺序稍加叙述:

1. 清代乾隆年间的茂隆银厂曾经兴盛于阿佤山60年之久。该厂位于阿佤山腹地的茂隆山,厂址炉房位于班洪、班况、永邦三个佤人部落的交界地带。当地佤人早前就知悉该地有矿,但不识其种类与品位,且无开发意识,更遑论投入相应的机具设备与技术能力。据汉文史籍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有一个过去以赶马帮为生经常往返该地贩运货物的名叫吴尚贤的内地汉人,看准了此矿有巨大开发价值。他在说服并取得当地佤人酋长充分信任和同意的前提下,为明确彼此的利益与职责,曾按佤人习俗与酋长刻木为信。随后,吴尚贤便开始全权负责,组织和网罗大量有技术和经验的内地汉人,作为矿业工人进入该地,从事银矿开发。因矿藏丰富,规模较大,业务非常兴旺,此矿山的开采前后持续60多年,矿山人数最多时达到数万之众。后因吴尚贤被贪官陷害致死,矿工四散,清政府明令关闭了矿山。<sup>①</sup>

2. 班洪抗英事件。该事件发生在1934年2月8日,当时的缅甸早已沦为英帝国的殖民地。

<sup>①</sup> 罗春梅《评吴尚贤的悲剧人生》,载《红河学院报》2008年第6卷第3期。

1934年1月10日英国派出一支由100多名军人护送的矿藏勘测队,从缅甸腊戍出发,前往尚存争议的阿佤山区。该远征队与勘测人员于24日抵达中国班老炉房,在此首先遭到了班老佤人部落的坚决反击,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随后,势力较大的班洪王胡玉山召集当地佤人部落抗击英兵。获悉英国人强占佤山,云南景谷县的乡绅李占贤出于爱国义愤抵押家当出钱、出枪,组成西南边防义勇军,开进该地与佤人部落并肩作战,联手夺回了炉房、丫口寨等地。当时,中国正处于日寇入侵的关头,在此边疆危机深重、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之际,国内各界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对班洪抗争的声援。后来,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南京中央政府明令撤退并解散了义勇军,以“胜者尤败,败者尤胜”的乌龙结局草草收场。国民政府随后裁撤了暗中支援西南义勇军的地方官员,义勇军首领李占贤也成为通缉犯,远避他乡。

3. 抗日斗争。1942年日本侵占缅甸后继续向缅北各地推进,开始进犯阿佤山区。当时,国民政府第五、六军分别驻扎在孟定、耿马、双江、普洱,其侦查人员活动到班洪、南大、户算。日军侵入阿佤山区时,进入班况、班角、户算、户板、滚弄的英军仓惶撤走。国民政府在阿佤山区各族人民的要求下派遣军队保卫阿佤山区,进行抗日活动。阿佤山区各族人民在“保土抗日”的号召下相继组织了“耿沧支队”、“阿佤山游击队”、“阿佤山特区自卫队”、“班洪自卫支队”等。其中“耿沧支队”组建于1942年,到1944年已发展成3个大队、1个特务连,共500余人,活动于耿马、孟定、猛董、麻栗坝附近的老街等地。在李文开副司令的率领下,该支队在老街(今属缅甸的果敢)成立指挥所,与日军作战三、四次。“阿佤山游击支队”成立于1943年,是由张经武带领耿沧支队特务连到永和组织的队伍,编制为8个大队(实有6个大队),共约1000余人。阿佤山游击队组织起来后,其司令部转移到新地方(即今缅甸佤邦的勐冒县)。第一大队队长原系莱姆山土司,缅甸被日军占领后带领土司武装到阿佤山,被收编为第一大队。该大队活动在新地方以西地区。第二、三、六大队活动于莱姆山、滚弄江边的梅龙渡口、新地方和永和一带。第四大队活动于西曠,曾4次出击新地方,第八大队活动到允恩。张振武同阿佤山自治指导员张万美在新地方召开了一次头人会议。到会的有董猛土司罕华相、永和头人三木块、绍帕李老三,还有班洪、班况、班老、班控、班猛、塔田、敢色、嘎喜、蛮相、允恩、眉龙、拢达、拢乃、永邦、尼来等部落头人。张振武在会上说“日本要来占阿佤山,我发枪给你们保卫中国。”张振武对张万美说“绍兴、绍帕王没有来开会。”张万美回答说“不怕!他们与蒋介石是一家,他们会打日本的。”“阿佤山特区自卫队”成立于1943年,是由马义昌受国民政府十一集团军委任而组建的,分为4个大队,约700余人。该自卫队主要活动在南腊、蛮鸠、班控、班弄、供别、那衣、蛮弄、拉撒、塔田等地,与日寇作战9次,打死日军30余人。<sup>①</sup>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提及的佤人村寨或部落,20世纪60年代以后多被划入了缅甸境内。

4. 国共内战的余音。1949年后,国共内战进入尾声。部分国民党残军败退入缅北,盘踞活动在中缅未定界地段(处在阿佤山的中南部地区)长达30年之久(从50年代到80年代)。在中缅未定界地段最终确立前的10年间,由于未定界问题的存在,考虑到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没能深入缅甸彻底消灭这支残军,使得该地区情况变得比较复杂,成为新中国西南地区最不稳定的主要地区。该残军在阿佤山的缅甸部分地区扩充兵员与实力,曾发展到2万—3万人的规模,而且一度“反攻大陆”,失败后再度退回缅甸。随后,在中缅两国交涉边界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政府达成内部协议,有限度地出兵缅甸与缅甸政府军联手,试图一举消灭这支盘踞于缅甸的国民党残军。最终,台湾当局迫于压力,将滞留缅甸的残军部分迁台,部分就地解散,<sup>②</sup>

① 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民族研究所编《云南佤族历史调查材料》(六),第45页。

② 秦怡辉《金三角国军血泪史(1950—1981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9年,第1页。

从而终结了陆上国共内战的余音。

### 三、中缅边界问题

在 1886—1960 年内,中国历经清王朝、中华民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三个时期,中英、中缅牵涉中缅之间阿佤山部分的一系列边界条约的签订,以及在此前后各相关国家政府间的活动,有助于我们透视佤人和佤人社会近百年间的变迁轨迹。其间的相关条约包括 1886 年的《缅甸条款》、1894 年 3 月签订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1897 年签订的《中缅条约附款》、1941 年 6 月中华民国政府与英国政府通过外交换文方式签订的边界协议(即“1941 年线”)、1960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等。每一项协议的背后其实都有非常复杂的故事,将这些故事展开来,便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历史记忆。

下面是笔者根据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和朱昭华《中缅边疆问题研究——以近代中英边界谈判为中心》两书中有关中缅南段边界问题所涉阿佤山部分的描述,所做的资料整理和分析。

1886 年 7 月 24 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缅甸条款》其中有云“二、中国允许英国在缅甸现实所秉一切政权,均听其便;三、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sup>①</sup>此条约的签订,不仅意味着清政府承认了缅甸归英人所有,而且标志着中英有关中缅两国云南段边界问题交涉谈判的开启。条约签订后,中国驻英使臣曾纪泽与英国外交部交涉,“英愿将潞江下游以东之地归还中国”,<sup>②</sup>即将整个阿佤山区都划归中国。但英国很快就派出密探深入阿佤山腹地了解情况。张成渝《侦探记》中有载,光绪十六年(公元 1890 年)英国在没有预先告知中国的前提下,即派人进入阿佤山区活动。自腊戍起行,经孟连土司境直至车里。进入阿佤山区时,则自蛮冷的班阳、班桑而北,过南坎乌(即今属缅甸的南抗武、莱冷)、公明山、班况,至户班,沿途勘察地形(1893 年印度测量局所印地图之阿佤山区部分,即为此次的密探队所测绘),而且沿途采取“以夷制夷”的方法引诱部分当地佤族头人投英,挑起部落间争斗。从这个角度看,英国人在有关阿佤山归属的未来谈判中,已经开始抢占先机。

1894 年 3 月 1 日,清朝驻四国大臣薛福成与英国外交大臣劳斯伯里在伦敦签署《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约文共 20 条,其中第三条第二节,便是有关阿佤山区分界的条文“自北纬二十三度四十分起,边界线循萨尔温江至工隆北首之边界。即循此工隆边界向东,留出工隆全地及工隆渡归英国,科干(麻栗坝)归中国。由此循英国所属之琐麦与中国所属之孟定分界处之江而行,仍随此两地土人所熟识之界线,至界线离此江山处,以萨尔温江及湄江(即澜沧江)之支江水分流处为界线,约自格林尼治东经九十九度,北京西经十七度三十分,北纬二十三度二十分,约至格林尼治东经九十九度四十分,北京西经十六度五十分,北纬二十三度,将耿马、猛董、猛角归中国。在格林尼治东经九十九度四十分,北京西经十六度五十分,北纬二十三度处边界线,即上一高山岭,此山名叫公明山,循山岭向南而行,约至格林尼治东经九十九度三十分,北京西经十六度五十分,北纬二十二度三分,一镇边厅地方归中国。然后期限由山至西斜坡而下,至南卡江,即顺南卡江而行,以孟连归中国,孟仑归英国。”<sup>③</sup>1897 年底至 1900 年,中英联合勘界委员会根据 1897 年界约实地划界、立桩后,英国企图迫使清政府承认已经被它侵占的阿佤山区的部分土地。因相互间分歧很大,未能就自南定河岸九十七号界桩起,至南卡江与南马河交汇处邦桑(现为缅甸境内之邦康)附近的第一号界桩的一段达成妥协,这段边界问题被迫搁置。这段边界此后历时三十多年也未能得到解决,这就是

①③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82 年,第 485、577 页。

② 转引自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以近代中英边界谈判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58 页。

人们通常所称的“中、缅南段未定界”。

1941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关键时期,中国急于打通连接缅甸的抗战运输大通道——滇缅铁路。英国以缅甸政府同意修筑腊戍到中缅边境铁路为条件,向中国提出一次性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的要求。国民政府为使正在修建中的滇缅铁路工程从速完工,被迫于1941年6月18日在重庆以换文的方式同英国划定了搁置多年的中缅南段未定界。而这条界线,基本上就是以前两国勘界委员会划出的条约线为基础的,几乎完全按照英缅政府的意图划定。其中阿佤山的1/4划入中国境内,3/4被划归了英属,包括前文已述的炉房、户班以及班洪部落西部的许多村寨也都划入了缅甸境内。这些佤人世代生存的土地,成为当时民国政府为获取这条运输线而被迫付出的领土代价。这条界线,即为历史上所称的“1941年线”。此后,世界格局变化迅速,国民政府修建滇缅铁路计划遂成泡影,落得个劳民伤财、无疾而终的结局。由于战争的关系(先是抗日战争,紧接着又是国共内战),中缅两国间一直未能进行具体的勘界和划界的后续工作。中缅边界问题实际仍处于搁置状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6年11月,针对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向缅甸政府提出若干建议,其中第一条即为阿佤山区一段,中国政府同意撤回在1952年因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而进入“1941年线”以西的中国军队,在边界达成最后协议之前,缅甸军队不进驻中国撤出的地区。<sup>①</sup>1960年1月28日中缅两国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议》。1960年6月到9月,中缅边界联合勘界、划界工作。同年10月,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至此,中缅两国彻底完成了实地标界工作,勘定了2000多公里的中缅边界,树立了402座中缅文界碑,拖延了半个多世纪的中缅边界问题尘埃落定,划上了历史的句号。

#### 四、相关问题的讨论

本研究所讨论的国家意识问题,核心和基点在于围绕近现代阿佤山的佤人社会展开,同时也是笔者确立的研究视角。因此,主体性和话语即佤人社会存在的事实,佤人的观点、佤人的态度、佤人的表达,遂成为本文探讨的首选议题。此主体性和话语的预设前提是:佤人社会这个人们共同体是历史形成的。人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使其发生变化以满足自我需要的过程中,具有自觉参与和主观能动的本质特点,它可以具体表现为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话语是主体性的主要体现方式。毋庸置疑,佤人伴随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由此观之,佤人基于族群利益的思考与行动从未停歇过,只不过在现代国际政治格局的大背景下,佤人总体上政治参与不强,加之地处偏远,人微言轻,很容易被主流社会忽视或边缘化。

回过头来看,茂隆银矿的开采无疑构成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佤汉族群互动。审视此过程,有几点值得探讨:其一,吴尚贤之所以能够在佤山开矿,前提是取得了当地风筑酋长的信任和同意,并订立规约。如若不然,随后的开采以及汉民的大量涌入佤山显然无法实现。这说明,彼时代表当地佤人民众的风筑酋长仍视自己为一方土地的代表,没有他的允许,外人不得在其辖境从事任何经济活动。因此,吴尚贤采用尊重与互信的方法,其中“刻木为信”的契约方式尤其关键,最终使其成就了一番事业。其二,“在彼打槽开矿及走厂<sup>②</sup>贸易者不下两三万人”,又“外夷虽产矿硃,不谙煎炼,多系汉人赴彼开采,食力谋生,安静无事,夷人亦以享其利”。<sup>③</sup>可见,数万人的衣食住

① 周恩来《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0日,第1版。

② 所谓“走厂”是指过去在各民族广布的云南山区,靠赶马帮往来各地交易谋生的人的各种行为。

③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9—240页。

行,全凭挖矿收益进行交换来获取,说明现代意义上的贸易与交换此时已在佤山频繁出现。这无疑对国内学术界至今延续的“解放前(1949年之前),佤族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或者说原始社会崩溃和阶级社会正在形成的阶段”<sup>①</sup>这种基于单线进化论语境下的定论,提出了质疑。其三,随着该银矿的关闭,厂民四散,其中不少人留居在阿佤山,形成汉人佤化的“夷化”现象。在笔者的田野调查里,今天茂隆山的中国一侧,仍有叫湖广寨的寨子,他们的先民大部分是当年的矿工。而“班老”这个寨名,据当地佤人介绍,就含有“做酒的寨子”的意思。举寨做酒,若无一定规模的交易是很难想象的,而在当地交易的提供对象,无疑即为茂隆开矿的数万汉人。佤族学者赵富荣教授在其《阿佤山佤族中的汉族姓氏探源》一文中,也表达了与笔者类似的观点。<sup>②</sup>这证明,彼时汉佤之间的互动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涉及方方面面。其四,“该酋长愿照内地厂例,抽科作贡,计每年应解银一万一千余两”。<sup>③</sup>这表明,佤人酋长风筑凭借丰厚的矿山收益,用大量银矿自愿向清政府上贡。这也开启了近代历史上佤人社会第一次越过傣族土司,直接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先例,而因受到清王朝重视,直接影响到后续政府对佤人酋长的册封与任用。同时,亦表明了佤人社会对中原王朝国家认同的产生,只不过,此认同首先是经由对汉人的认同,而后才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更为重要的是,以凤筑和吴尚贤为代表的佤汉两个族群间的互动,凸显了一套值得后人遵循与效仿的良性模式——平等、尊重、互利互惠以及对“刻木为信”之共同契约的不折不扣的遵守。

我们发现,这次佤汉两个族群之间的互动,呈现给后人的是一次友好与平等的交往经历。整个过程,不但未曾出现两个族群的冲突与争斗;相反,表现为和谐相处、彼此交融、相得益彰的结果。双方在交往中彼此释放出的朴素的相互帮助、互通有无的平等理念,乃是能够维持生存与共、互利互赢的前提。

今天来看,“班洪事件”中,英国军队到达的炉房,虽确系地处清政府与英国人商议过的未定界,事实上也并未越过中英两国政府此前约定中彼此认可的大致分界线。但在佤人看来,炉房向来为班洪、班老、永邦三个部落共管之地,也曾是孟定、耿马傣族土司的管辖范围,这些部落从未臣属过缅甸。因此,在他们眼中,英军进占炉房,当然是越界行为,完全有理由进行抵抗。<sup>④</sup>佤人及地方爱国民众在此次事件中自发表现出来的英勇举动,自然流露的是本土社会对合理性与正义性的认知视角,彰显的是一种基于地方知识的主体性认知,这显然与国家的视角大异其趣。<sup>⑤</sup>

“班洪事件”的爆发,时间点正好处在日寇欲霸中国这样一个亡国危机的历史关头,因其挑动了国人那根敏感而紧绷的民族主义神经,自然引起举国哗然,纷纷声援班洪佤人抗英行动,形成席卷全国的抗议声浪。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佤人社会国家认同的进一步加深。

抗日战争期间,整个亚洲不分国家与民族,实际都卷入了这场救亡图存、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反侵略战争中,地处交战地区的阿佤山自不例外。但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彼时彼刻,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将中国军队视为自己的军队,将中国士兵视为自己的子弟兵;而且很多人直接参

① 佤族简史编写组/佤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佤族简史》(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② 赵富荣认为,由于清乾隆年间为开发“茂隆”银矿而招收了川、湘、鄂、粤等地大批有技术的汉族矿工和铁匠,银矿倒闭后,这些人流落到阿佤山的边沿地区建立村寨,后来与佤族不断融合,于是佤族中就出现了汉族姓氏。在他的调查中,发现1800年茂隆银厂的倒闭,致使大批汉族矿工转到佤山中心区西盟永广一带开挖银矿、办银厂。有的矿工带着眷属,就地开田种地。许多矿工就与当地佤族通婚并定居在阿佤山,现在西盟永广等寨子就有不少“靠儒”(佤语,意为汉佤后代)。详见赵富荣《阿佤山佤族中的汉族姓氏探源》,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5期,第70页。

③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有关云南史料汇编》,第239页。

④ 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以近代中英边界谈判为中心》,第226页。

⑤ 由此,同样可以理解,为何在处理善后事件中,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当地人抵御外侵的爱国举动,非但不支持,反而采取裁撤暗中支持抗英的地方官员,解散当地义勇军,通缉主持抗击英人的爱国义士,这些看似极为反常的方式方法。

加到游击队或国民政府的部队里并肩作战。数据显示,已经达到全民参与的程度。<sup>①</sup>由此视之,这一时期,佤人社会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可以说达到了空前强化的地步。

对近现代历史上久拖未决的中缅边界问题,以及英、中、缅三国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划定过程的审视,从另一个侧面加深了我们对佤人社会国家意识产生背景的了解。

清王朝时期,从《缅甸条款》到《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签订,佤人虽无从知晓中英之间关于国界谈判与划分的详情,也无法预知将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但与汉族的交往经年有余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从统治者权力层面看,当地政治的格局历来是以傣族土司与佤族部落头人之间辖制与被辖制的关系为主轴的,而当地傣族土司在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接受了中原王朝的册封。比如与佤山部落社会关系密切的孟连土司、耿马土司、孟定土司等均接受了中原王朝的册封。因此,佤人社会与中原王朝之间通常不会产生直接关系,往往要通过傣族土司来联系。也就是说,佤人社会与中原王朝之间存在的只是一种间接的统治关系。乾隆年间,茂隆银厂兴旺时,佤人酋长风筑跨过傣族土司,直接向清朝廷上贡银两,可谓是近代史上开先河的一次特例。

从民间层面观之,社会生活中普通百姓对汉族的认同,经过了很长时期的相互交往,已达到相当的深度。而对新来的英人则不甚了解,更谈不上有什么认同,所以直接采取抵制态度。就在1900年中英联合勘界的时候,英国方面的有些人员就在猛董(今沧源县城)遭到当地佤人的攻击。结果,英国方面的曹大林和继德理被当地百姓打死。英国领事烈敦也遭到佤人百姓的围杀,幸亏清政府派来的官兵奋力抢救和阻止,才捡回一条命。<sup>②</sup>可见,此时期的佤人社会,由于非常明显地倾向于对中国的认同,因而普通民众借由这种对英国人使用激烈拒斥的手段,以表达对英缅政府的不认同。

从国民政府签订“1941年线”到19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议》前后来看,佤人社会的国家认同出现错综复杂的过程。

首先,国民政府残军败退缅境,并在未定界区域盘踞。他们在边境地带与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缠斗的过程中,造成了佤人社会在对“谁是正统中国”的认知上的困惑,客观上导致阿佤山一度处于一种混乱的社会局面,国共两军产生拉锯,都在争取当地民族的认可。笔者在调查中发现,那段时期,争取各个村寨或部落头人的认同,显得尤为重要,几乎达到了在阿佤山想要推进一切工作的唯一指标。换言之,谁争得了当地头人的认同,就意味着谁在某个村寨、某个部落甚至某一地区站稳了脚跟。此过程延续了将近十多个年头。

其次,未定界区域的最终划定,客观上造成原来视如完整的佤人社会一夜之间变成两个不同国家国民的现实。这使得佤人社会的国家认同出现了部分漂移。也就是说,被划入缅甸境内的佤人,在他们的意识里一直以为自己是中国人,但此刻不得不面对已经被划成了缅甸人的现实,这与他们的自我定位和想象可谓南辕北辙,由此产生错愕与不解之感;而另一些佤族人虽然被划入中国界内,但同一族群亲戚朋友间的这种分离,同样让他们感到不适。二者在情感上均遭受到很大挫折。

<sup>①</sup> 佤山抗战时期,整个阿佤山寨几乎全民动员投入抗日的热潮。他们对在佤山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和游击队,积极给予了人力、物力上的支援。班弄一次缴三十三师大米二十一桌(每桌600斤,合12600斤);塔田、公鸡、班洪、班老,昼夜送粮草;敢包、官中、允恩等每月给国民党游击队半开200元、大米两桌;嘎喜、眉龙、窝说,每月送半开150元、大米一桌半;贺孟、尼哇、公鸡每月送半开100元,大米一桌;永和送大米十三担另三箩;公鸡、莫弄、敢色、蛮盾、嘎喜、龙垮一次即缴大米七大桌;旁岩送牛两条,大米二桌,半开1200元;嘎喜、官中送国民政府33师二团三营半开1000元,要求保护;敢色则以牛两条、大米一千斤送33师表示欢迎;阿别亚送米两担、香油一砸,半开600元,鸡一支给国民党游击队,游击队则以一支步枪还之。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民族研究所编《云南佤族历史调查材料》(六),第46页。

<sup>②</sup>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1辑),中华书局,第330页。

最后,国民政府军残部向西南的退却构成国共内战的余音。伴随着新中国的迅速挺进与政治经营,退入缅境的国民政府军残部所导致的国际问题以及微妙的中缅关系,更加重了阿佤山社会与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未定界使得阿佤山曾经笼罩在变幻莫测、摇曳不定的政治风云之中。为此,佤人用了很长时间才渐渐抚平这场心灵的跌宕,承认了既成的社会现实。然而那段不堪回首的迷惘,无疑也构成了佤人社会曾经的一段历史。

此类话题在中国虽然早已不称之为问题。但即使是60年后的今天,缅甸佤邦内外的绝大部分佤人的认同问题却仍然严重。至今,他们如同缅北很多少数族群的境遇一样,并未获得缅甸国家层面普通公民的实际身份。近年来,因与执政的军政府关系有所缓和,缅甸政府工作人员曾经到佤邦地区办过一些身份证明。不过,缅甸政府给当地人办的身份证与普通缅甸国民的身份证却是有区别的,并不能通行全国。当地大多数佤人依然在默默吞咽着“我是谁”的困惑与无奈。对他们而言,国家认同的混乱、漂移与重塑,并未划上历史的句点。当中缅边界问题尘埃落定,致使居住在两边的佤人族群被迫各自走上迥然不同的未来之路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缅甸政府联手驱逐原国民政府在缅甸境内的军事存在,同时,也明确划分了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缅边界。紧接着,在很短时间内消除了传统佤人社会村寨、部落的制度格局,也将中缅各自的政治理念与社会制度模式推进到境内阿佤山的所有区域。

对于历史上没有过统一的族称的散布在阿佤山各地的佤人来说,佤族这个统一的称谓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62年,中国政府在征得佤人代表同意的前提下,确定将他们统称为佤族。作为中国境内55个少数民族之一,这个称谓经过几十年来的使用,虽然严格意义上只限于中国佤人,但今天,基本上已为往来关系密切的中缅佤人所普遍接受。

在缅方,如前所述,佤人社会一度陷入更加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达10多年之久。在20世纪60年代末及随后的20多年间,以意识形态为最高理想的缅甸共产党在缅北轰轰烈烈发展开来。阿佤山缅方一侧成为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缅共控制期间,阿佤山缅方一侧最明显的改变就是他们花很大精力,在基层建立起行政组织,取代并消除了当地佤人部落间各自为政的零散状态,将当地佤人团结了起来。但是,由于长期依靠外援,只搞政治斗争,不注重当地经济建设,缅共领导机构中大缅甸族主义严重,加之后期高层内斗频繁,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尽头。而留下来的却是,缅共占据阿佤山20年,百姓生活丝毫没有获得改善。1989年4月17日佤邦建政至今,这个政府一直秉持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在其本国政府至今难以插足的阿佤山区,以高度自治的实际地位,有选择地继承和借用中国制度管理的方式方法,经营着缅方一侧的佤人社会。经过20多年的努力,阿佤山缅方一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跨越性发展成就。1989年佤邦建立前,境内仅有缅共时代修筑的300多公里的毛路,现已修建了3000多公里,是20年前的10倍,其中,包括了800公里的柏油和弹石路面,基本实现辖区各县、区、乡都通公路;20年前,佤邦地区仅有学校20多所,在校学生不足500人,如今,已发展为拥有学校360多所,在校学生达36700多人,其中有10所学校设有初中或高中部。20年前,全邦的医院卫生所只有20多所,目前已发展到190多所。1989年初,佤邦仅有一座40千瓦的水电站,今天已先后建立起8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359千瓦。佤邦自1995年起,为大力发展禁种替代产业,即向全邦和国外企业发出号召,鼓励种植橡胶、茶叶和其他经济林木,获得积极响应,目前在南北两地已种植橡胶、茶叶20多万亩,50多万亩,至今,部分橡胶树已开始可以割胶。20年来,矿业开发也从无到有,佤邦开办了自己的冶炼厂,且已初步生产出经济效益。<sup>①</sup>

<sup>①</sup> 详见《佤邦政府主席鲍有祥2009年在庆祝佤邦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

## 五、结 论

综上所述,早在清乾隆年间,在传统佤人社会中,佤汉之间就曾经产生了大规模的交往与互动,这表明了佤人社会对中原王朝国家认同的产生,但此认同首先是经由对汉人的认同,而后才上升到国家层面的。1934年“班洪事件”的爆发,客观上推进了佤人社会国家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佤山抗战的逐渐深入,全民抗战成为佤人社会的主流,阿佤山的广大民众几乎都将自己视为国家当然的一员。此阶段,佤人社会的国家认同,达到了空前强化的地步。而以上各历史阶段佤人社会所认同的国家,无疑指的就是中国。

进入现代历史阶段,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缅两国正式签订边界条约前后,佤人社会的国家认同曾经一度出现混乱、漂移与重塑。

中国境内的佤族社会,在民族区域自治相关条例的支撑下,以佤族称谓为统一的民族政治身份,分别成立了两个佤族自治县,会同其他55个兄弟民族,完全参与到国家建设与发展的进程当中,国家意志在那里得到了认真地执行与贯彻,已经达到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经脉动荣辱与共的程度。

而缅甸一侧,在被迫经历国家认同的转移之后,佤人又陷入了另一段曲折、混乱的社会情境。直到最近的二十年,佤邦政府的建立,成立了佤人第一次独立自主治理自己地方的现代政权模式。这个政体的宗旨和诉求是在服从缅甸联邦统一国家领导的前提下,实现邦级(即省级)行政权力的高度地方自治。<sup>①</sup>在以“民族团结与民族发展”为理想旗帜的佤邦政府的带领之下,那里的佤人社会真正地获得了暂时的和平生活环境、重拾民族自信,且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囿于缅甸国情,他们至今尚未摆脱政治上的不平等和社会发展走向上的不确定状态。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Wa people living across the border of China and Myanmar. Based on the author's fieldwork, it examines the building of Wa's national awareness in the context of 200 years of modern history. Specifically speaking,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Empire" in the intermittent Chinese - British demarcation negotiations awakened their vague national awareness; the mining activities of the Han people in Washan in the 18<sup>th</sup> century strengthened their economic exchanges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contacts with the Qing government; the resistance against the British - Burmese government infiltration into Washa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ir awareness of Chinese identity; the combat against Japanese with the GMT government during WWII deepened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disputes between CPC and GMT over Indochina plunged them into a confus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settlement of Chinese - Burmese demarcation in 1960s contributed to the respective building of their national awareness across the border. In fact, the coexistence of the building of national awareness and split of ethnic identity is a common problem for cross-border ethnic minorities in multi-ethnic countries, and is of typical significance.

(郭锐 副教授,云南民族大学,昆明,650031)

〔责任编辑:吴家多〕

<sup>①</sup> 目前佤邦政府下辖邦康特区、勐冒县、温高县、勐波县、勐阮县、南邓特区六个县级行政单位。